

辽宁大学211工程文艺学子项目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

王巍
宋绪连 著

● 魏晋南北朝卷

辽宁大学 211 工程文艺学子项目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

魏晋南北朝卷

王 巍 宋绪连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 魏晋南北朝卷/王巍等著. —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1. 5

ISBN 7-80669-015-8/I·5

I. 中... II. 曲... III. 文艺思想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641 号

目 录

第一编 魏晋文艺思想	1
第一章 绪论——魏晋文艺思想概述	1
第二章 建安时期的文艺思想	27
第一节 曹操的文艺思想	27
第二节 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41
第三节 曹植的文艺思想	57
第四节 建安七子的文艺思想	74
第三章 正始时期的文艺思想	84
第一节 阮籍及其文艺思想主张	84
第二节 阮籍《乐论》的艺术观	92
第三节 嵇康与《声无哀乐论》	104
第四节 桓范尚实恶虚的美学追求	118
第四章 西晋的文艺思想	123
第一节 傅玄宗经的文学思想倾向	123
第二节 左思与皇甫谧的文学思想	134
第三节 陆机《文赋》所反映的文艺思想	141
第四节 陆云“清省”的艺术美追求	168
第五节 挚虞《文章流别集》的产生及其所反映的 文艺思想	173
第五章 东晋的文艺思想	185
第一节 葛洪《抱朴子》所反映的文艺思想	185

第二节	陶渊明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贡献·····	203
第三节	李充的文艺思想·····	212
第四节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观·····	218
第五节	顾恺之的绘画艺术观·····	226
第二编	南北朝文艺思想 ·····	240
第一章	绪论——南北朝文艺思想概述·····	240
第二章	刘宋时期文艺思想·····	247
第一节	晋宋时期山水诗的审美转型·····	247
第二节	宗炳画论的艺术观·····	258
第三节	王微《叙画》的美学价值·····	268
第三章	齐梁时期文艺思想·····	273
第一节	沈约“声病”说与永明文学·····	273
第二节	三萧的文学思想·····	289
第三节	谢赫画论的审美观·····	298
第四节	刘勰的文艺观·····	309
第五节	钟嵘的文学思想·····	321
第四章	北朝的文艺思想·····	231
第一节	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	331
第二节	北朝的诗歌与诗论·····	337

第一编 魏晋文艺思想

第一章 绪论——魏晋文艺思想概述

魏晋时期，也包括建安时期在内，是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发展时期。同文学创作一样，这时期的文艺思想也相当活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对后代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曹操提出了写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①的主张；论赋的创作则指出“嫌于积韵”，主张要“善于资代”^②。曹丕的《典论·论文》，从文学的地位、价值以及作家、文体、文学批评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看法，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论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批评者的文学修养及批评态度、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所阐明的文学见解是颇有见地的，是建安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论，对时人和后人有很大的教益和启发。傅玄的《七谟序》、《连珠序》等，清晰地阐明了某种文体的得名缘由、发展源流，并列举和评论了一些作家作品，同时对一些文体的体制、风格、特点进行了概括。陆机对一些文体的体制风格特点进行了概括。陆机的《文赋》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对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极为形象地论述了

① 引自刘勰：《文心雕龙·诏策》。

② 引自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文学创作的思维过程，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上有很大的贡献。挚虞《文章流别论》现虽仅存佚文，但所论文体颇为全面，后来刘勰在创作《文心雕龙》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葛洪《抱朴子·外篇》所论“今胜于古”的文学观，打破了传统的宗经文学观，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除了这些专门性的文论之外，还有这个时期其他的一些文章，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吴季重书》、《鞞舞歌·序》、《前录自序》等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文艺思想。

这个时期音乐思想表现得很突出。阮籍的《乐论》颇为深刻地探讨了乐的本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以合“自然之道”的乐教为美，并强调礼乐教育对于“天下之为乐者”的重要。嵇康的音乐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中。此文的美学命题就是“声无哀乐”。以“声无哀乐”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在“求自然之理”中，去追求个人精神解放。

这个时期的书画艺术思想也相当突出。曹植曾提出画“存乎鉴者”^①的观点。指出了画的重要作用。陆机对绘画艺术虽没有长篇论述，但提出“存形莫善于画”^②的思想还是很可贵的，说明了画的价值。因为画对于“存形”是最好的一种形式，充分认识到了绘画艺术的重要。王羲之则提出作书当“意在笔前”的书法艺术思想，重“意”思想非常突出，首开以“意”论书之风。顾恺之探讨了“形神”问题，表现了重“神”思想，并提出了“迁想妙得”的绘画艺术主张。还有一些人，如何晏、王弼、王廙等人，也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关书画论的思想观点。

一、魏晋时期文艺思想繁荣的原因

魏晋时期文艺思想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有突破和发展，探讨

① 《曹集铨评》

② 引自《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环境的作用

魏晋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动荡的岁月，尤其是建安时期，可谓是腥风血雨的岁月，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社会诸种矛盾极为尖锐，后来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豪强地主势力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纷纷起兵，逐渐形成割据一方的局面，最后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军混战的动乱时期。随之而来的便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面对这惨淡的社会，人们在苦苦地思索人生，思索生命的意义。产生时光飘忽，人生无常的感叹，并通过其作品反映出来。那么在文艺思想上也必然有所表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充分肯定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将其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学这种高于任何时代的认识，就是他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这个时期阮瑀与应场关于文质关系的探讨，也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东汉末年，存在着利口善辩之人以追求浮奢言辞而谋取私利的现象，于是论证了质朴的品质在为政治国中的重要，进一步肯定了文质应相副。这种思想必然反映到文艺思想中，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想，自然是非常可贵的。其后阮籍与嵇康的音乐思想也无不是时代的产物。陆机的《文赋》所提出的观览万物的观点，就是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对西晋整个宇宙人生的感慨和体验，其作品主要反映了他的“志匡世难”的思想。陶渊明在创作上所表现的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思想倾向，以及独特的美学追求，亦是东晋社会现实的产物。总之，时代环境与条件不仅造就了文学家，也极大地影响了文艺思想家。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文艺思想主张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与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魏晋时期文艺思想的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

魏晋时期以及之前汉代文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代是以赋体文学的繁荣而著称的。赋被堪称为汉代文学的正宗，汉代的赋既有描绘山川、都市、宫苑、物产、游猎、歌舞等一系列宏伟壮丽形象的大赋，又有指刺社会现象、表达内心情怀、抒发人生慨叹的小赋。魏晋时期风格各异的抒情小赋应运而生，标志着辞赋创作进入了新时期。这时作家辈出，作品丰赡。诸如曹丕、曹植、王粲、阮瑀、应瑒、陆机、潘岳、陶渊明等辞赋作家，创作出了众多的辞赋作品，形成了辞赋创作新的高潮。这时的赋所表现出的千姿百态的体式、情采缤纷的风格、优美精湛的技巧，构成了这个时期赋精美多姿的艺术风格特征。诗歌在魏晋时期也呈现出了发展的崭新局面。之前的汉代是以乐府民歌与文人诗“古诗十九首”而闻名的。乐府民歌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无情地提露和控诉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十五从军征》一诗，描写一个从十五岁就开始在外面征战，到八十岁的高龄才回家乡的老兵，回到家乡看到的是“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现象，所以他只能“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此情此景，他又怎能吃下饭呢？于是出门望着天边，泪水不停地流淌下来。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极为鲜明。“古诗十九首”的内容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既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这是失意士人在社会动乱之中苦闷内心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诗歌创作又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时作家辈出，文人荟萃。仅建安时期就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蔡琰等二十多名诗人。其后正始时期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两晋时期有傅玄、张华、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等著名诗人。这时创作的作品丰富，题材广泛，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

北朝诗》，建安诗歌就有三百多首，其后仅阮籍的《咏怀诗》就有八十二首。陆机现存的诗歌，包括一些不完整的诗篇在内，就近一百二十首。这个时期诗歌内容也及为丰富，有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的，有反映战乱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有反映丈夫长期在外征战或服徭役，而使家室怨旷、妇女哀伤的，有反映妇女不幸命运的，有描写游子寄居他乡的哀怨的，有描写亲友离别而哀伤的，有对亲人早逝的追悼，有反映壮志豪情的，有描写田园生活的。还有写爱情、游览、饮宴、征战、赠答、咏史、游仙、山水等等。内容如此之丰富，在文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期的创作，文体多样，五彩缤纷。其中诗歌这种文体得到了空前发展，四言诗在两汉时期走向衰落，而到了建安时期，则出现了一些很有欣赏价值的篇章，“照射出夕阳似的血红的恬美的光亮出来”^①。五言诗，是建安诗歌的主要形式。这时文人创作大量五言诗，出现了“五言腾踊”的局面。两晋时代五言诗数量也是最多的。与此同时，六言诗、杂言诗也都有名篇佳作问世，曹丕的杂言诗《大墙上蒿行》对后代影响很大。王夫之评论此诗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篇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②七言诗则以它完整的形式出现在建安诗坛上。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向称“七言之祖”。单就诗歌的形式看，已是蔚为大观了。其他文体在魏、晋艺苑中也是争奇斗妍的。建安散文以“清峻”、“通脱”的特点闻名于当时，称美于后世。特别是章、表、书、檄、诏、令等应用体散文得到了迅速发展。颂、赞、铭、箴、碑、诔、吊、论、连珠等也都大量涌现。这时的散文不仅数量多，而且由质朴趋向“华美”、“壮大”。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先秦还只是处于胚胎时期，萌芽于两汉，而到了建安时期则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② 《船山古诗评选》。

《风俗通义》、《列异传》以及笑话《笑林》等，为我国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魏晋时期作家辈出，作品丰富。由于这时作家多，文学作品丰赡，才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各种文艺思想及主张随着创作的繁荣而出现。例如，由于汉代和曹魏时期辞赋作品的大量涌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才以赋的创作为标准，来评论作家创作水准的高低，指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建安时期文体大备，所以曹丕才能在《典论·论文》中论文体，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主张。这里所论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无不是建安文人所普遍运用的文体。除此而外，魏晋时期所出现的作家论、创作论，对文学发展的看法等等，也都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因为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观点也无从谈起。

（三）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想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所言甚是。在汉代思想领域中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种统治更是不可动摇。武帝立五经博士，使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惟一工具，在这种社会思潮下，很多人自然要从事经学。到了东汉时期尤甚，儒生遍及全国。统治阶级对经学的重视，必然导致文人都去研究经学章句，文学自然无地位可言，只能是经学的附庸，那些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②不相附的都要一并排斥和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②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否定。这样，文学家也就不能享受到应有的地位。而被当成“倡优畜之”，文人本身也就自然轻视文学创作，这不仅阻碍文学的发展，而且也使艺术思想受到严重的桎梏。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不仅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同时也使严重束缚人们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原来的控制力，逐渐走向衰落。《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随着儒学的衰微，文学也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不再是经学的附庸、阐发经义的工具了。建安文人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把它看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时文学不仅有了独立的地位，而且提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高度，如此之伟业，文学家自然也摆脱了“倡优”的难堪境遇，纷纷从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盖将百计”的局面，这必然促进了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建安文人思想解放，大胆冲破儒学，这对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曾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这无疑是对东汉重德轻才的一种反叛，他在三次下的《求贤令》中，都表现了这一思想主张。人们思想解放，也就敢于创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对待赋创作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这是他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结果。在这种文学思想主张下，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辞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小赋。曹植曾主张“异代之文未必相袭”^①。在实践上他也体现了这种主张。建安文人由于思想解放，才敢于提出创新的文学主张，这也必然推动了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

由于建安文人思想解放，所以他们也敢于对天道、天命之说大胆地提出怀疑，破除对神仙的迷信。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这是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补充。这样就

①：《魏志·曹植传》。

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看做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这种神学迷信的观点充斥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这样个人才能、智慧的发挥自然也就受到了限制。到了建安时期，情况就不大相同了，很多人对天命提出了怀疑。曹操就公开声称：“性不信天命之事”^①。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他也坚持了这种思想，否定了神仙长生之说，认为人的生命不能完全听从自然规律的摆布，“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②。从既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辩证地回答了怎样对待人生的问题。曹植对天命的怀疑也表现得很突出，提出“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难烛”^③。“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④。认为天道是幽暗不明的，天命变化无常。在《赠白马王彪》中又写道：“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认为天命实在值得怀疑。建安文人还能破除对神仙道术的迷信。曹操在《善哉行》中写道：“痛哉世人，见欺神仙。”深深地感叹世人被神仙欺骗。曹丕在《芙蓉池》中写道：“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吾意，保已终百年。”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不是赤松子和王子乔，哪一个能够成为神仙呢？只有使自己心情愉快，才能长命百岁。在《典论》中他又力辟道术：“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饥餐琼蕊，渴饮飞泉。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若莫返，潜者莫形，足以觉也。”这个认识还是很深刻的。由于建安文人在思想上破除了天命和神仙的迷信，更加着眼于社会现实，更注重于主体的个性、气质、天才与文艺创作的密切关系，所以才将文学创作与生命的不朽相联系。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曹丕

① 《让县自明本志令》。

②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③ 《神龟赋》。

④ 曹植：《节游赋》。

才提出了“文以气为生”的崭新命题。

到了正始前后，文化思想背景与建安时期又有所不同。这时刘邵的《人物志》出现了。《三国志·魏书·刘邵传》中记载说刘邵“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可见其《人物志》是出现在正始期间。《人物志》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与政治上用人相关的人物品藻，当然人物品藻早些时候就有，并非始于刘邵，但不同的是：首先，以前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寿夭等评论，常常是和相术相联系的。如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仆（指蒯通）尝受相人之术，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对人的“骨相”及其与“命”、“性”的关系也有探讨。可见相术、相法在汉代是颇为流行的。其次，刘邵以前对人物的评论，追求的多是道德修养的完美，如《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就是说“中庸”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水准。孟子则将人的道德修养分为六个等级，即善、信、美、大、圣、神等。这些品评标准无疑也具有一定的道德、哲学、审美意义。而刘邵在此基础上，将品藻人物由道德水准转向所评论主体的才能、个性、智慧上。所以在《人物志》中指出“人物之本，出于情性”。而“情性之理，甚玄而微。非圣人之察，其熟能究之哉”？提出了“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的说法。并且又提出了与人内在的智能、德行、情感、个性相关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质之征”。这里有的虽然与表现人的智能、个性牵强一些，但对于品藻人物还是很有意义的。与刘邵同时代的何晏，将刘邵的这种具有政治性人物品藻朝着两个方面转变，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是从政治上如何鉴别任用人才转向对理想的社会政治和人生的意义价值的哲学探讨，由此产生了玄学。另一个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对人物个性才能的评论转变为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这在两晋时代获得了极大的

发展，并直接影响到文艺和美学。上述两个方面又是互相紧密地联系着的。玄学对人生的意义价值的探讨是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藻的哲学基础，同时玄学所要求的智慧、语言、风姿、生活态度等等，又正是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藻的重要内容。”^①可见，从刘邵的人物品藻到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是这个时期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阮籍的《乐论》、《清思赋》、《大人先生传》以及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是在这种文化思潮中诞生的。当然，阮籍、嵇康本身就是玄学家，在这些作品里，除了表现他们对无限的追求的根本思想外，更为可贵的是能看到他们的审美意识及对审美境界的追求。

西晋时期曾有过短时间的稳定与繁荣，在思想文化上表现出与建安和魏时的不同。就是说这时受玄学的影响也很大，而同时儒家思想也表现得很突出，就以陆机而言，其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还是以儒家思想倾向为主。这时用文艺来描写和歌颂统治阶级的富贵之气成为一种创作趋势。如石崇、潘岳等人创作的《金谷诗》就是例证。再如左思的《三都赋》，乃为大赋的遗响，曾有着“洛阳纸贵”的辉煌。这时在创作上则表现出了重视词藻华丽的倾向。在歌颂富贵荣华的同时，内心则又交织着人生苦短、社会动荡不安、祸难随时而至的慨叹，内心的各种情感时时争赴文人的笔端。陆机的《文赋》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中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主张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与创作追求，是曹丕“诗赋欲丽”主张的进一步升华，显示着文学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西晋由于“八王之乱”而瓦解，前后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使中原地区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南渡之后建立的东晋王朝，自然面临着战乱之苦，为封建帝国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

^① 《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第79页。

又一次受到冲击，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再呈高涨。这时，对人生的慨叹以及对“情”的看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下，人们更加追求富有审美性质的才情、风度、言谈等。不仅如此，江南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着人们，所以这时便产生了纵情山水的风尚。人们用审美的眼光来观照“千岩万壑”、“云兴霞蔚”、“山川映发”等自然景观，由于玄学清谈之风大兴，自然重视玄学所说的“神”、“神明”。因而更加追求与佛相联的超脱的“玄远”、“神明”。就是这个时期所追求的审美境界与审美意韵。值得注意的是对那些超尘绝俗理想人格之美的追求，对超脱“玄远”、“神明”的观察是很困难的，同时又是难以捕捉与表述的。这也就是东晋时期人们所追求的“言不尽意”之美。也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想背景下，才出现了王羲之的以“意”论书，顾恺之的以“形神”论画的理论。文学艺术家都普遍追求神“韵”之美。王羲之、顾恺之等人的书画艺术思想，正是这时审美意识的最好体现。

二、魏晋文艺思想所表现的主要内容

魏晋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是辉煌灿烂的，从总的趋势来看，是向着重艺术特质方面发展的。重个性、重抒情、重神韵、重形式美、意境美的探讨。不断地发现文艺自身的特征，并探讨其发展规律。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创作个性论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上的许多问题，其中关于作家的个性及风格是他探讨的重要问题。指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即使是父子、兄弟，因其“引气不齐”，在创作上也表现了不同的个性，“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为了突出地表现出建安七子每个人不同的创作风格，曹丕对他们的创作情况及其创作风格进行了对比研

究。指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瑯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丽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曹丕认为这些作家之所以创作风格不同，为文巧拙有素，是因为所禀之气不同所致，因为“文以气为主”。这是当时创作中出现的重个性的倾向在理论上的极恰切的表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丕重视创作个性，探讨创作个性，是对建安时期创作实践的总结。建安文人都注重抒发个人的情感，曹操作为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作品中更多的是抒发对现实的慨叹、征战的艰难、对贤才的渴望以及忧世不治等情感，表现了他救时济世、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与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集中地体现了曹操豪气奋迈、苍凉悲壮、质朴刚建的艺术风格。敖陶孙所说的魏武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①，张玉穀所说的“老瞒诗格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②，刘熙载所说的“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③等，都是对曹操这种创作个性的概括。曹丕与曹植同为曹操之子，他们的创作个性不仅与其父不同，而且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曹丕从贵公子、皇太子到皇帝的境遇，使其创作多着眼于“闺里小事”，特别注重对游子思妇感情的描写与抒发。表现出了情思婉约悱恻、多抚媚柔情的风格。也就是沈德潜所说的“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④。曹植虽只小曹丕五岁，与曹丕基本是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但由于其经历、理想的追求与曹丕不同，其创作个性也炯然有别。曹植的

① 《诗评》。

② 《古诗赏析》卷首。

③ 《艺概》卷二《诗概》。

④ 《古诗源》卷五。